

《皇清职贡图》 版本流传考论*

黄金东

内容提要 《皇清职贡图》版本多样，就制成时间先后有彩绘本、写本与刻本三种。不同版本的《皇清职贡图》虽然内容相同，但流传和受众却各有不同。其中彩绘本主要陈设于宫廷，向皇帝和大臣展示；写本存于宫廷和地方官府藏书楼，重在阅览和利用；刻本流传面最为广泛，既用于陈设和颁赏，也鼓励其在民间流传和利用。透过《皇清职贡图》各种版本的存放和流传，可以探讨其背后潜在的政治动机。

关键词 皇清职贡图 版本体系 清代 版本流传 政治动机

《皇清职贡图》^①是我国古代民族图册的集大成者，其版本形式多样，不仅最初完成的彩绘本有手卷和册页两种形式，期间还不断进行增补，日后又陆续制成了多种白描写本和刻本。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了清代国内外各族群的服饰样貌、风俗习惯、生产方式与清廷的关系以及贡赋情形等内容，表达了清朝“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以及建立“民族共同体”的思想^②，是研究清代民族历史、文化、服饰及中外交往等的珍贵史料。

《皇清职贡图》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从最初对制作过程和版本源流的考证^③，逐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图像表征：《皇清职贡图》研究”（项目编号：21BMZ089）与北京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地区馆藏清代南方民族图册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ZDA08）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乾隆时期最早完成的彩绘本名称为《职贡图》，《皇清职贡图》为写本和刻本的名称，少数文献亦有记录为《皇朝职贡图》者。二者实为同一事物，为方便叙述，文中一般称为《皇清职贡图》。

② 苍铭、张薇《〈皇清职贡图〉的“大一统”与“中外一家”思想》，《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③ 参见庄吉发《谢遂〈职贡图〉画卷的绘制经过及其史料价值》，载氏著《谢遂〈职贡图〉满文图说校注》，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年，第1—21页；畏冬《〈皇清职贡图〉创制始末》，《紫禁城》1992年第5期；畏冬《乾隆时期〈皇清职贡图〉的增补》，《紫禁城》1992年第6期；畏冬《嘉庆时期〈皇清职贡图〉的再次增补》，《紫禁城》1993年第1期；祁庆富《〈皇清职贡图〉的编绘与刊刻》，《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

步扩展至民俗学^{〔1〕}、语言学^{〔2〕}、人类学^{〔3〕}和艺术学^{〔4〕}等多学科视角的研究，成果丰硕。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国内学者多将《皇清职贡图》作为反映现实的史料，国外学者则更多地将其视为清朝构建帝国形象^{〔5〕}或种族观念^{〔6〕}的视觉材料。就《皇清职贡图》的流传而言，现有成果仅在部分论著中偶有提及某种版本曾经或现今的收藏地，即使如周妙龄《乾隆朝〈职贡图〉〈万国来朝图〉之研究》的学位论文，辟有专节讨论《皇清职贡图》的流传、各版本的制作及关系，也仅就谢遂《职贡图》之《四库全书荟要》本、《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武英殿刻本等进行简要介绍，并未进行深入而专门的梳理，对于清朝廷制作众多版本《皇清职贡图》之目的论述，也是几笔带过^{〔7〕}。此外，学界对清代图书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大多集中于民间刻本书籍的传播^{〔8〕}，偶有涉及到官府图书的流通及管理等方面也多为总体性论述^{〔9〕}，并无涉及《皇清职贡图》流传的专门内容。本文试图厘清《皇清职贡图》版本体系脉络，钩沉相关档案材料，以期完整梳理《皇清职贡图》版本的流传情形，阐释其背后深刻的政治目的。

一 《皇清职贡图》存世版本概况

《皇清职贡图》版本多样，就制作方法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为彩绘本。有手卷和册页两种形式。手卷本存世四卷，正本仅存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金廷标绘《职贡图》卷二，副本存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朝佚名《职贡图》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朝谢遂《职贡图》两份；

〔1〕 秦永章、李丽《〈皇清职贡图〉与清初青海少数民族服饰习俗》，《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侯瑞秋《〈皇清职贡图〉与赫哲族民俗》，《满族研究》1998年第3期；李绍明《清〈职贡图〉所见绵阳藏羌习俗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0期。

〔2〕 佟颖《〈皇清职贡图〉满语词汇分析》，《满语研究》2010年第1期；佟颖《满语同义连用现象研究：以〈皇清职贡图〉为例》，《满语研究》2012年第1期；齐光《解析〈皇清职贡图〉绘卷及其满汉文图说》，《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

〔3〕 林茨《〈皇清职贡图〉与人类学影像》，《中国摄影家》2007年第4期；吴雪梅《蛮夷形象的帝国想象——以谢遂〈职贡图〉中的贵州苗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4〕 袁俊华、戚峰《〈皇清职贡图〉与鄂伦春民族题材绘画的发生》，《美术大观》2013年第2期；王蔚《〈皇清职贡图〉的绘画史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5〕 [美] Laura Hostetler (何罗娜),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6〕 [美] Emma Jinhua Teng (邓津华),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7〕 周妙龄《乾隆朝〈职贡图〉〈万国来朝图〉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3—32页。

〔8〕 曹红军等《出版视角下的清代盛世文化政策：以经、史类中央机构出版物为考察对象》，《出版发行研究》2012年第11期；孙文杰《清代图书流通传播渠道论略》，《图书与情报》2012年第6期。

〔9〕 杨玉良《清代中央官纂图书发行浅析》，《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4期；朱赛虹、宋淑洁《清前期官府图书的流通及管理》，《华学》第8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281—286页；项旋《清代殿本售卖流通考述》，《史学月刊》2018年第10期。

此外尚有嘉庆朝摹绘增补本，存有故宫博物院藏《职贡图》卷三及不明藏地的卷二。册页本共八册，目前所见存七册，其中法国国家图书馆存第一、第二、第三、第七册，另外第四、第五、第六册为私人所藏。

二为写本。有《四库全书荟要》本和《四库全书》本两种，均为九卷。其中《荟要》本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摘藻堂本，《四库》本为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等藏本。

三为刻本。有三种版本，均为九卷本。其中乾隆四十五年(1780)武英殿刻本存于首都图书馆、中国民族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及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等地；嘉庆十年(1805)武英殿重刻增补本藏于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清翻刻本存中国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

由上可知，《皇清职贡图》版本复杂多样。就绘制时间而言，以上三种版本，绘本最早、写本次之、刻本最晚。写本源于绘本，刻本又源于写本^①。

二 《皇清职贡图》版本流传考

按照常理而言，如果出于单纯的阅览或存史之需，出于经济因素考虑，并不需要制作多种内容相同、版本各异的《皇清职贡图》。这背后一定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以及深刻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因此，要想充分了解《皇清职贡图》的价值，不仅需要关注图像本身的内容，更要考察其流传的情形及其所蕴含的政治意义。

（一）彩绘本陈设于内廷，既彰显权威，又可供皇帝阅览

乾隆朝彩绘正本及嘉庆朝重绘本藏于内廷乾清宫。《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载：“（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二日，接得员外郎图阿押帖，内开九月二十二日，首领吕进忠交乾清宫《职贡图四卷》一分。”^②此外，《石渠宝笈续编》《三编》所录乾隆朝金廷标等绘《职贡图四卷》、嘉庆朝《庄豫德等画职贡图四卷》均列在“乾清宫藏”条目下^③；清胡敬辑《国朝院画录》亦载：“《职贡图》旧藏乾清宫，为丁观鹏等合画”^④；中国国家博物馆现存金廷标绘《职贡图》卷二钤有“乾清宫鉴藏宝”朱方印。以上实物和档案记载证实《皇清职贡图》手卷正本的原藏地为乾清宫。

彩绘册页本原藏圆明园。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职贡图》第一、二、三、七册均钤有“圆明园宝”[图一]，即为物证。畏冬根据第六册后白页上的“赠与姿拔伯爵”(LE COMETE CHASSELOUP-LAUBAT)旧体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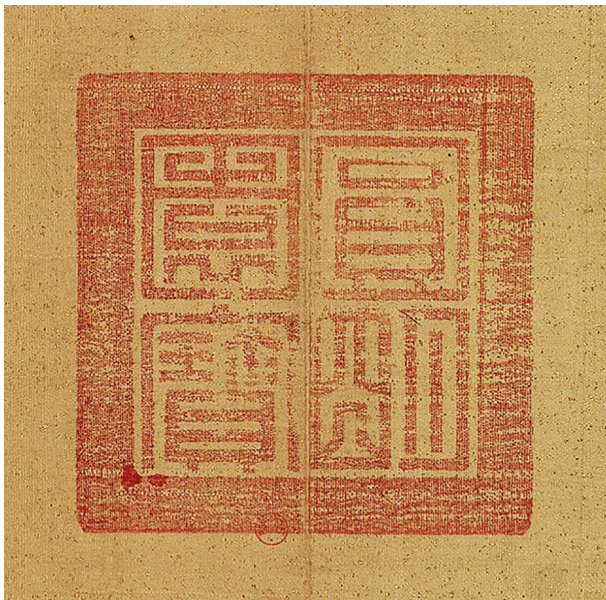
① 畏冬、刘若芳《〈苗瑶黎僮等族衣冠图〉册及〈职贡图·第六册〉考》，《故宫学术季刊》2009年第2期。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8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0页。

③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石渠宝笈续编》第2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86—394页；《钦定石渠宝笈三编》第2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243—245页。

④ 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5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67页。

〔图一〕《职贡图》第一册“圆明图宝”印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文及法国作家伯纳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对当时洗劫圆明园情形和分配物品情况的记录，考证此图册原藏于圆明园中，于清咸丰十年（1860）被法军掠走并作为贵重物品运回法国，最初被赠送给娄拔伯爵^{〔1〕}。

乾隆朝彩绘副本之谢遂摹绘本原藏热河避暑山庄。《石渠宝笈三编·避暑山庄八》明确著录了《谢遂职贡图》的详细信息^{〔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特征与著录内容完全一致，钤有“避暑山庄”朱印。此外，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二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向热河总管札文，要求奉旨将当地存放的《职贡图》第二卷送京。第二年正月初八日，军机处回复热河总管，说本月初六日送来《职贡图》一卷已收讫，等办理完后，仍送归原处安设^{〔3〕}。又过了半个月，军机处传旨，将《职贡图》手卷一轴发回热河，仍于原处收藏^{〔4〕}。以上材料所载可证此《职贡图》第二卷为谢遂摹绘本，原藏于避暑山庄。另外一份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彩绘副本，因无钤印和落款等信息，尚不清楚其原藏地。然而，从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军机处致盛京将军咨文中要求将盛京《职贡图》第二卷送京的记录判断^{〔5〕}，此当即为除谢遂摹绘本外的另一份彩绘副本，曾陈设于盛京皇宫中^{〔6〕}。

朝廷将《皇清职贡图》彩绘本陈设于清宫内廷中，足以显现其重要性。乾清宫自不必说，避暑山庄和圆明园在当时也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而盛京作为清朝统治者的福兴之地，其皇宫的政治象征意义亦自不待言。实际上，《皇清职贡图》在乾隆的亲自主持和多次过问下完成，体现了乾隆皇帝的意志和思想，本身就是权威的象征。通过《皇清职贡图》，乾隆构建了一幅内外向化输诚的帝国形象，作品将许多与清朝没有实际朝贡关系的西洋诸国列入其中，展示了清帝国无与伦比的“威望”。乾隆在发布启动《皇清职贡图》的编绘时明确指出，绘图的目的之一在于“以昭王会之盛”^{〔7〕}，毫不避讳其政治野心。乾隆将彩绘本

〔1〕 前掲畏冬、刘若芳《〈苗瑶黎僮等族衣冠图〉册及〈职贡图·第六册〉考》。

〔2〕 前掲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石渠宝笈三编》第11册，第262—266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57—2158页。

〔4〕 前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51册，第272页。

〔5〕 前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57页。

〔6〕 至于其陈设为临时性或长久性，目前材料尚无法确定，但盛京皇宫曾陈设《职贡图》彩绘本则是确定无疑的。

〔7〕 《高宗纯皇帝实录（六）》卷三九〇，中华书局，1986年，第121页。

陈设于内廷宫中，通过《皇清职贡图》中图文的展示，不仅有向世人夸耀其帝王功业和威德^①，更有方便其随时阅览，以便有效区分和识别这些民族，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统治”的现实考量。

（二）写本存于皇家和地方官府藏书楼，兼具供皇帝阅览和有限开放的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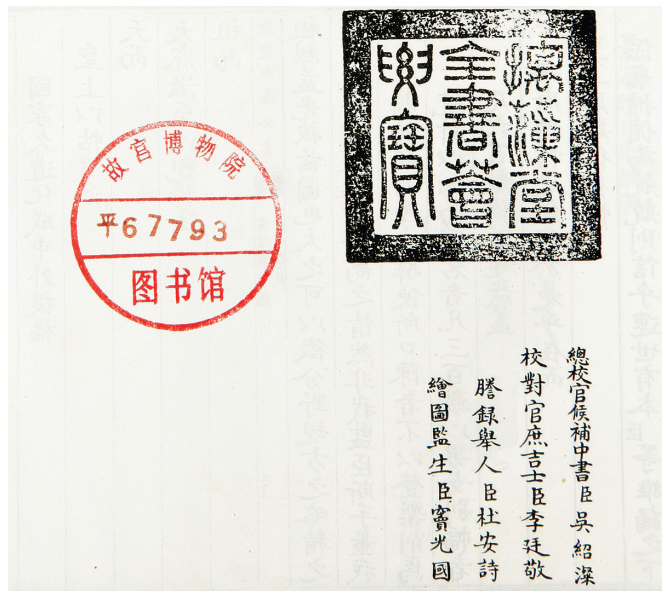
《皇清职贡图》写本有《四库全书荟要》本及《四库全书》本两种。《荟要》本共两套，乾隆有诗曰：

“荟要书成度摘藻……摘藻先陈速，味腴继贮亦非迟”，注：“荟要粹全书之精，每部凡万二千册，一贮摘藻堂，于己亥年告成；一贮味腴书室，于庚子年告成。”^②由此可知，《四库全书荟要》成书后先陈于紫禁城内的摘藻堂〔图二〕，后又抄写了一部副本陈于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提要》载：“荟要萃全书之精，自乾隆癸巳特诏编录，阅七载告成。命于乾清宫北摘藻堂排贮，铃摘藻堂印识之，以别于御园味腴书室所藏者也。”^③

此两处皆为禁中藏书之地，其建造目的即为供乾隆休息时读书所用，“列架弄摘藻堂内，以备临憩阅览”^④，乾隆认为“朕每憩此观书，取携最便”^⑤。味腴书屋位于圆明园内，环境清幽，在此地读书，乾隆颇感惬意，“含经堂畔敞书筵，味道腴常喜静便”^⑥，“随宜构书屋，到处可翻披。于学贵时习，所无要日知”^⑦。

另外一种写本藏于四库全书七阁中。作为乾隆亲自主持，前后耗时十八年时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编纂而成的《四库全书》，其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保存古籍，更是为了“使用”。因此，在《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乾隆特意强调其利用问题，称：“四库所集……非徒广金匱石室之藏，将以嘉惠艺

〔图二〕“摘藻堂全书荟要宝”铃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① 乾隆将自诩为“十全武功”之一的平定台湾事件以“谨按”形式补入不同版本类型《皇清职贡图》的行为，以及将武英殿刻本集中赏赐给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的举动，即表露出了此心态和目的。

② （清）弘历《圣制重华宫茶宴内廷大臣翰林等题四库全书荟要联句并成二律（庚子）》，（清）庆桂《国朝宫史续编》卷八二《书籍八》，清嘉庆十一年内府钞本。

③ 前揭庆桂《国朝宫史续编》卷八二《书籍八》。

④ 前揭庆桂《国朝宫史续编》卷五五《宫殿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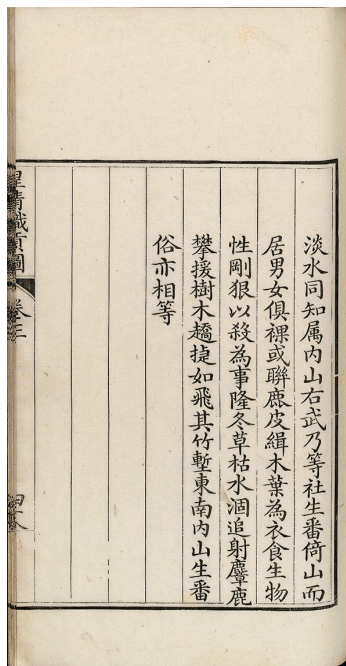
⑤ 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08页。

⑥ （清）弘历《御制诗二集》卷八三《味腴书屋》，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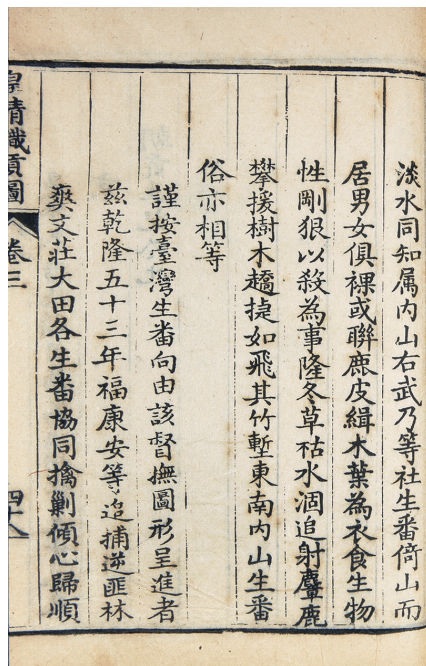
⑦ 前揭弘历《御制诗三集》卷八三《味腴书屋》。

〔图三〕三种刻本卷三福建省末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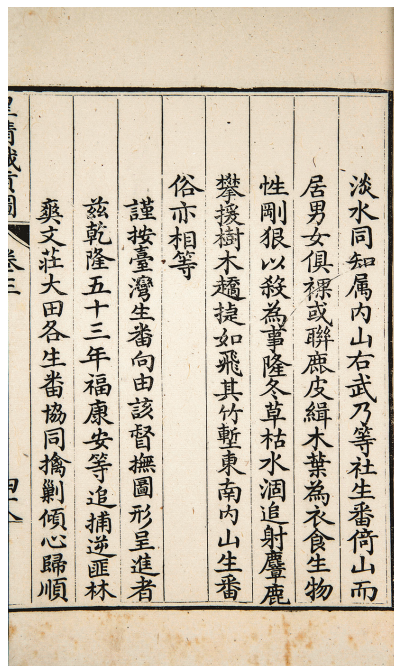
1. 乾隆殿本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2. 翻刻本 故宫博物院藏 3. 嘉庆殿本 故宫博物院藏



1



2



3

林，其牖后学，公天下之好也。”^{〔1〕}

北方内廷四阁虽然深藏宫中，近乎皇帝的私有物，但为了宣扬文教，实施文治治国大略，乾隆特别允许大臣和翰林使用文渊阁《四库全书》的藏书，并告诫管理者，“翰林原许读中秘书，即大臣官员中，有嗜古勤学者，并许告之所司，赴阁观览”，但同时也强调，“第不得携取出外，致有损失”^{〔2〕}。说明朝廷大臣和一部分官员有机会利用这些藏书。对于“士人等固不便进内抄阅”文渊阁藏书的情况，乾隆则积极支持他们利用藏于翰林院的四库底本，“翰林院现有存贮底本，如有情殷诵习者，亦许其就近检录，掌院不得勒阻留难”^{〔3〕}。

对于南三阁，乾隆更是特意叮嘱当地官员，让士子可以随时抄阅。在启动南三阁抄写工作时，他下发谕旨：“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着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分，安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4〕}

由上可知，乾隆将《皇清职贡图》列入《四库全书》中，让大臣及士子随意抄阅，其本意就在于“不特

〔1〕 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518页。

〔2〕 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518页。

〔3〕 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89—2190页。

〔4〕 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599页。

内府珍藏，藉资乙览，亦欲以流传广播，沾溉艺林”¹，目的是“副朕乐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²，“以副朕振兴文教、嘉与多士之至意”³。他认为，“帝王敷治，文教为先”，故“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⁴。乾隆通过推动《皇清职贡图》的流传，传达了其“稽古右文”的用意，达成了向世人宣传“文治”的作用，进而引领全国文教。

（三）刻本流传面最广，受众最多

刻本形式的《皇清职贡图》〔图三〕由于易于复制、携带，翻阅亦方便，因而成为了众多版本类型中流传面最广、受众最多的一种。然而，由于刊刻主体不同，不同版本的流向和功用也有少许差异。

《皇清职贡图》武英殿刻本属内府图书，其刊刻有严格制度规定，刷印数量由皇帝直接过问，一般多用于陈设和颁赏。陈设用书一般规定每种十至二十部，如前文所述，主要陈设在大内的主要宫殿、书斋及行宫、苑囿、庙宇等处，供皇帝随时检阅⁵。同时，武英殿刻本图书也用于赏赐。在清代，皇帝将内府刻书赏赐给王公大臣以示尊宠，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做法。对大臣来说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一般在京官员亲自领取，外地官员则由驻京提塘代领递送本府，督抚等人需至郊外望阙跪迎到府。所有受赏图书须陈设在显要处，再行专折奏谢。目前，笔者从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目录系统中检索出六封为受赏《皇清职贡图》所上的谢恩折⁶，时间集中于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之间。显然，赏赐给这些大臣的《皇清职贡图》为武英殿刻本。四川总督文绶所上谢恩折中称，朝廷在绘写完成《皇清职贡图》后，又“寿之梨刻”⁷，明确指出了所赏赐《皇清职贡图》的版本类型为刻本。

不仅如此，朝廷还将《皇清职贡图》武英殿刻本赐予外国使节。《清史稿》载⁸：

初，琉球、安南、暹罗诸使来，议政大臣咸会集，赐坐及茶。乾隆初元，谕停止。时属国陪臣增扩，敕所司给《皇清职贡图》以诏方来。四十七年正月，紫光阁锡燕，朝鲜、琉球、南

〈1〉 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89页。

〈2〉 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768页。

〈3〉 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599页。

〈4〉 《清史稿》卷一〇六，中华书局，1977年，第3114页。

〈5〉 从现存实物看，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国民族图书馆所藏《皇清职贡图》武英殿刻本均原陈于清宫中。其中中国民族图书馆所藏1958年受赠于辽宁图书馆前身——东北图书馆，为毛装形式。按，毛装形式的武英殿刻书不在少数，辽宁图书馆珍藏原沈阳故宫之殿本书不少即为武英殿本的毛装图书。由此可知，中国民族图书馆藏本当为武英殿刻印后送往盛京皇宫收藏者。

〈6〉 受赏者为直隶总督袁守侗、浙江学政王杰、四川总督文绶、两广总督巴延三、户部右侍郎彭元瑞、陕甘总督勒尔谨，对应档号为：04-01-12-0194-055、04-01-12-0195-031、04-01-12-0195-062、04-01-12-0195-065、04-01-12-0195-066、04-01-12-0195-067。

〈7〉 （清）文绶《奏为御赐〈皇清职贡图〉谢恩事》，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12-0195-062。

〈8〉 前揭《清史稿》，第2676页。

掌陪臣与焉。

可见，为了扩大《皇清职贡图》的影响，乾隆将使节赐茶的仪式改为赐《皇清职贡图》。借由其中的图像，乾隆不仅清楚地向周边属国展示帝国的权力，更定义了来朝各成员在清帝国的“位置”¹¹。19世纪初，生活于乾隆、嘉庆年间的朝鲜学者韩致渊在其著作《海东绎史》一书中即将《皇清职贡图》列入“仪物”篇，作为了解清帝国的重要参考书目¹²。

总之，不论是赐予王公大臣还是外国使节，其象征意义都远大于实际意义，其作用不仅可宣扬朝廷权威，亦可昭示德政、展示帝国的高大形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洋洋得意地指出，《皇清职贡图》的创制“以纪盛德昭宣，无远弗届，为亘古之所未有”¹³。

售卖也是殿版《皇清职贡图》的重要流通方式。乾隆初年，朝廷曾于崇文门监督处售卖内府颁行余下之书。乾隆七年(1742)，武英殿修书处奏准“其颁发之处交内阁拟奏，准其通行”¹⁴。乾隆九年，朝廷正式设立武英殿通行书籍售卖处，准许售卖殿版图书成为一项固定的制度¹⁵。有清一代，凡内府售卖图书均有详细记录，以备日后因政治等原因修补或禁毁，其中就有殿本《皇清职贡图》。根据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光绪间武英殿卖书底簿》抄本记录统计¹⁶，从同治三年(1864)至光绪五年(1879)，售卖殿本《皇清职贡图》的记录共有17条，售出35套，其售价为每部价银一两八钱五分和一两八钱六分两种，购买人员有折配匠赵俊英、松司长、礼部主事延茂、礼部主事刘锡全、员外郎春某、员外郎扎某、民人童世荣、民人张廷芬、提调处协修杨绍和、副内管领吉纯、笔帖式玉恒、内务府笔帖式玉森等人。其中购买数量较多者有员外郎春某两次五部，折配匠赵俊英三次八部。由此可看出，殿本《皇清职贡图》的购买人群既有普通民人，亦有工匠和官员，阶层较广。其中多次购买多部者，从其身份来推测，购买目的或是赠送他人，或为转卖书肆赚取差价，由此进一步扩大了该图的流通范围。此外，从十余年价格非常稳定的情况看，利润并非清廷售卖殿版图书的考量范围，应为按制作成本出售，意在传播思想，扩大殿本的流播范围，从而达到“人人诵习，以广教泽”¹⁷的目的。

至于翻刻本《皇清职贡图》的流向，不似殿版流传有序，有固定的陈设地或档案记载，因此很难得知具体受众。然而，从请印或翻刻殿版图书多为地方官府或个人的情况推测¹⁸，受众应多为中下层民众，

〈1〉 赖毓芝《图像帝国：乾隆朝〈皇清职贡图〉的制作与帝都呈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2年第75期。

〈2〉 [朝]韩致渊《海东绎史》第2册，卷二〇，朝鲜光文会，1913年，铅印本。

〈3〉 魏小虎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汇订(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4〉 《武英殿修书处为知会事》(乾隆七年)，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44747-001，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5〉 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5页。

〈6〉 《清同治光绪间武英殿卖书底簿》，《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28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05—140页。

〈7〉 《高宗纯皇帝实录(十)》卷七〇，中华书局，1985年，第130页。

〈8〉 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336—340页。

流传范围普遍而广泛。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皇清职贡图》翻刻本占有刻本比重达95%以上，由此不难推知其流传的广泛性。

三 小结

文化史学家库尔特·塔科斯基(Kurt Tucholsky)曾经说过：“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1〕}确实，与单纯的文字相比，图像更具魅惑性，更易深入人心，透过图像独有的特质，往往能以更加自然、不着痕迹的方式反映或建构出制作者的意图。段炼认为，图像的意义不仅在图像本身，而更在于图像的制造者和观照者，以及二者在相关语境中的互动关系^{〔2〕}。彼得·伯克也告诫那些准备利用图像作证据的每个人，应当以研究它们的制作者的不同目的为起点^{〔3〕}。这些论述提醒我们，在使用图像史料时除了关注其内容本身外，更应考察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意义。

与历朝历代各类“职贡图”多为供皇帝阅览或宫廷陈设不同，《皇清职贡图》的流传更为多样，不仅陈设于宫廷内殿、皇帝书斋、行宫、庙宇、苑囿等彰显朝廷权威，同时方便皇帝阅览之处；而且通过制作多种版本的方式，典藏于官方藏书机构或赏赐给大臣及外国使节；更进行售卖并允许官府、个人翻刻，极力扩大其流通范围和受众层次。这说明，《皇清职贡图》的制作从始至终都强调其利用问题，而非将其作为皇帝私人玩赏的图册。

这些内容基本一致而版本形式各异的《皇清职贡图》及其广泛传播自然有颂扬帝王功业统领天下文教，为实施有针对性的对外政策服务，达到“资治镜”之现实需要等考量。正是由于《皇清职贡图》所具有的多种重要意义，在乾隆及嘉庆年间，清朝廷才对其多次增补、复制及传播。美国学者何罗娜(Laura Hostler)指出，清朝通过致力于发展此类图册，就是希望以这些视觉材料来协助帝国管理。因此，她认为《皇清职贡图》是清朝治下“世界”的理想化呈现，有其现代史的意义^{〔4〕}。由此可知，《皇清职贡图》是清朝廷构建“大一统”政治文化的一种方式，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性。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责任编辑：盛 洁)

〔1〕 [英]彼得·伯克著，杨豫译《图像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页。

〔2〕 [加]段炼《视觉文化：从艺术史到当代艺术的符号学研究》第11页，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年。

〔3〕 前揭[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第17—18页。

〔4〕 前揭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p47.